

#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开创意义

陈学明 马拥军 姜国敏

**[摘要]**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出了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进行新的“伟大斗争”和“伟大社会革命”,应对当今人类文明的重大挑战。中国的文明方案在新时代彰显了人类社会多样性,开辟了和平发展新路径,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示范,也为发达国家解决危机打开了思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将开创人类美好生活新的文明样式。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文明;伟大斗争;伟大社会革命

**[中图分类号]** D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18)02-0001-09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sup>[1](p.10)</sup>三个“意味着”表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中国的创新成就,同时与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全球复兴、与人类现代化的道路选择联系在一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要愈来愈发出世界历史意义,回应人类当今的新问题新挑战,指向一种人类文明新阶段、新形态的探索与建构。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新时代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史上的定位

### (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阶段划分与共产主义社会的超越性质

历史的阶段划分和形态归纳对马克思主

义的历史科学叙事具有特别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重新研究全部历史”<sup>[2](p.587)</sup>时,一个鲜明的分析范式和理论抓手就是运用唯物论的标准对历史进行分期,对历史特别是文明史历程加以总览式的把握。例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经典表述中,马克思揭示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对人们的全部其他生活起着根本制约作用,并以这种生产方式作为尺度,阶段性地划分了人类历史:“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sup>[3](p.592)</sup>马克思在这里以及他和恩格斯在其他多处地方,都对既往几个经济社会形态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进行了依次列举,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此基础上归纳出最为著名的“五种社会形态”的划分。<sup>[4]</sup>

除了这一类型的历史分期法,马克思也从人与人在经济活动中的相互关系着眼,提出过“三大社会形态”的划分: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建立在人们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占有社会生产能力基础上的自由人性。<sup>[5](p.104)</sup>学者们曾经争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究竟是“五阶段论”还是“三阶段论”,这种争论当然有其学理价值,但是许多学者在阐发这两种阶段划分观点时,却往往忽视

作者:陈学明,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马拥军,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姜国敏,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无论在“五阶段论”还是“三阶段论”中,马克思都不是对各阶段平铺直叙、不是把各段差异平等视之的,他尤其注重指出那“第五”或“第三”的共产主义阶段同之前的阶段相比,有着根本区别和超越,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两阶段论”。

所谓“两阶段论”,实质就是说这种社会发展阶段叙事,不是在纸面上、概念上为了划分而划分,而是要通过历史阶段更替的理论叙事,科学地、带有超越性地论证出历史发展的下一阶段——共产主义。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不管阶级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而“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sup>[31](p.52)</sup>可以说,“两阶段”的前后决裂性,统摄着“五阶段”和“三阶段”的表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五阶段”式列举之末时说:“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sup>[31](p.592)</sup>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三阶段”式地谈论商品经济形式和未来自由人联合体形式时,也指出了通过“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后者要揭掉前者“神秘的纱幕”。<sup>[6](pp.95-97)</sup>

对这种根本区别和超越性质的强调,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历史理论创立和发展的全过程中。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新世界观萌芽阶段,马克思在区别理论形态上的新旧唯物主义时,就相应揭示了二者在社会基础上的对立:“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sup>[17](p.502)</sup>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相应段落也被选编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也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sup>[18](p.564)</sup>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表述当中,我们看到了前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区别的文明史意义,马克思主义认为后者才是真

正人的自由历史。

## (二)中国现代化的赶超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

近代以来,中国这一古老的东方文明国家遭受西方列强侵略,被强制纳入由西方所主导的、根本上说是受资本原则所规定的世界历史进程之中。但是,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绝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变成资本主义的外围附庸。在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特别是列宁主义阐明和初步实践了的非资本主义路线图,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基本方向,我们要以非西方的社会形态走向独立、富强、文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就是谋求建立一个与封建羁绊决裂而又超越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

马克思、恩格斯指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从历史观的高度呈现了“经济的社会形态”的一般演进态势。他们重点关注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形态变革方略,这个社会“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sup>[6](p.708)</sup>正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普遍生产”必然伴随着“贫困的普遍生产”的内在矛盾性,造成自身经济运动的危机和必然灭亡趋势,也促生了现代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的主旨和根本目的是:消除资本主义对生产力和社会财富的束缚,消灭剥削和奴役,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这种社会发展路线的科学性,本身是建立于现代化已经实现、生产力和财富积累高度发达基础之上的。从这个直接、狭义的尺度来看中国(乃至俄国),正如马克思所阐明的“两个决不会”的基本原理那样,或如邓小平更加直截了当评价的——“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sup>[19](p.225)</sup>中国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其实是在落后、“不够格”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前提下,在资金短缺、积累手段有限而工业化速度和体系化要求又很迫切的历史任务面前,由党和国家来全面主导资源配置,保证高积累和

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在较低水平上但较为公平地保证人民的基本生活和社会安定。<sup>[10]</sup>

因此,我们就是要看到,改革前后的体制转变,从“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到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是一脉相承,遵循着相通的历史条件和任务的,具有共同的世界历史分期地位。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一方面,遵循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面貌的原则预测和苏联式计划经济模式的先例,我们在相当大程度上压抑个人利益,并排斥商品和市场原则机制;另一方面,同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仍然存在按劳分配的“资产阶级权利”,存在商品、货币、价格、经济核算等市场机制的元素,我们“是实行国有和集体两种公有制形式,主张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际上形成了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层次性,造成了经济运行中一定程度的多主体性,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生产效率的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并且成为日后改革的必要探索和先声”。<sup>[11]</sup>

###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辟与新的伟大斗争的文明史意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孕育和发展历程中,就如马克思所预言的,“自然的发展阶段”“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sup>[6](p.11)</sup>“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sup>[6](p.8)</sup>因此,我们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sup>[9](p.373)</sup>这其中,我们特别是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中发展成熟的市场景象,吸纳到社会主义的范畴,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社会建制,并相应展开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改革和制度体制机制建设。正如邓小平所说,改革作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sup>[9](p.113)</sup>“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标志着“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sup>[9](p.142)</sup>

中国道路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导向和基本原则,如马克思所启示的那样“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sup>[6](p.11)</sup>邓小平指出:“社会主

义的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力,第二是共同致富。”<sup>[9](p.172)</sup>这种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界定,自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导向和基本原则,党的十三大将其具体提炼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sup>[12](p.450)</sup>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按照邓小平的目标设计,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言,“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sup>[9](pp.370-371)</sup>直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

现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从历史发展的辩证法角度来看,新时代也就意味着初级阶段进入了更高水平的时期,进入了“后半段”,同“前半段”相比已经有了改变。而且,“后半段”的目标,实际上已经超出了邓小平的原初设定。邓小平提出的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已经为2035年目标所涵盖,而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实际上就已经超过了原来的“初级阶段”标准,我们完全可以合乎逻辑地断言这是对社会主义“中高级阶段”的最初开启。

这也说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指导我们为新时代事业而奋斗的过程中,将愈来愈没有既成的“未来的景象”显示给我们、供我们作为赶超目标,我们在“照着讲”“接着讲”之后,愈来愈需要“自己讲”了。2013年,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讲到:“今天,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sup>[13]</sup>选择在这一时机给出这一提法,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正如毛泽东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说:“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sup>[14](p.32)</sup>

毛泽东在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

性时,正是将之同“伟大时代”、同准备进行新形式新特点的“伟大的斗争”联系起来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在今天适时提出,也正是理论对现实历史运动、现实斗争的科学反映。新思想以其战略眼光和理论勇气,准确定位了我们的富强程度,反映了我们在世界历史宏大进程中的既有成果和未来目标。在中国和世界发生着翻天覆地伟大变化的新时代,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sup>[15]</sup>我们从逻辑上完全可以说,就像伟大的中国革命、就像改革作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一样,新时代、新思想将在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上开启“第三次”革命。

## 二、人类文明的当今挑战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的新时代选择

当今世界上,人类文明发展面临重大挑战,呼唤着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出具有“伟大斗争”和“伟大社会革命”意义的回应,指出超越方向。这既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当代科学社会主义自身发展不可回避的时代命题,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彰显自身世界意义的重大机遇。历史上,列宁之所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邓小平之所以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个基本要点就是敏锐地抓住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问题形态,在理论上作出创新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样如此。

### (一)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异和衍生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共产主义社会在人的发展尺度上开启了新文明,这具有彻底积极的意义,是对“前共产主义”、对人类社会“前史”的扬弃。不过,共产主义也可以看作首先是最直接地从狭义的经济运动的尺度上,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否定,对资本主义本身不可克服的经济矛盾、经济危机的根本解决,是“后-资本主义”。这种直接否定关系就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

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sup>[13](p.37)</sup>

这种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是为了拯救人类文明成果本身,避免“经济的社会形态”自身蕴含的经济性荒唐、经济性毁灭:“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sup>[13](p.37)</sup>从这个维度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科学地论证出共产主义,首先就是遵循“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直接现实性逻辑。

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发生了较大的形态变化,它的社会矛盾、危机、对抗也相应发生了变异和衍生。除了原先经典形态的劳动和资本、无产和有产的清晰化、绝对化的两极分化,即使我们仅在经济领域当中看问题,也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已经发生金融化、虚拟化等变化,形态愈加繁杂,作用机制异常漫长曲折,贫富对立变得相对化、全球体系化。并且,资本的逻辑已经越出狭义的经济范围,侵蚀人的全部生活,造成人的生存状态的全面“单向度”化,乃至至于侵蚀与人本质统一的自然界,使自然状况在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重压之下急剧恶化。

在基本经济矛盾之上,当今世界每个人的身心之间、每个个体的境遇与社会体系结构之间也处于深刻矛盾之中。当今世界的人们在资本社会的生存和交往条件下,在资本漫溢出狭义经济生产交往的范围而对全社会加以统治的条件下,“单向度”的生存状态日益普遍。在资本主义的商品形式占支配地位的条件下,商品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范畴,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成为交换领域,资本的原则和逻辑内嵌于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之中,经由这个中介,人的全部社会生活都被影响、再塑造。为

了维系经济体系本身的运动,为了完成其全部建制的再生产,现代资本主义就要刺激消费,不断造就社会中消费主义的“虚假的需求”,人不仅在直接生产领域从属于资本而沦为劳动机器,而且也成为消费机器。

更进一步的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特别是生态危机的日益加剧。资本运动有两个基本原则——效用原则和增殖原则,它们决定了资本在本质上是反生态的,资本所主导和规定的人类生产生活过程,是同生态环境尖锐对立的。资本的效用原则要求在有用性的意义上看待和利用自然界,使自然界成为工具,从而丧失自身价值。而资本的增殖原则,则要求资本本身有无限增殖过程,它与效用原则连在一起,使自然界的工具化变得越来越严重。资本运动对自然界的利用是无止境的,这种利用过程和结果对自然界的破坏也是没有尽头的。

上述微观机制上的矛盾所引发的挑战暗流涌动,使当今人类世界宏观上和平与发展主题的具体内涵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就和平问题来说,无疑在邓小平关于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意义上,我们仍然处于“和平”之中。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资本主义具体主导和维系这种“和平”的世界格局秩序,已经开始逐步失灵、失范。并且,对于发展问题,资本文明的现代性弊病也已集中凸显,发展中国家欲发展现代化而失策,乃至反现代化力量在局部蔓延。和平与发展问题的新表现集中反映着资本主义旧文明的衰落,甚至美国和西欧这样的资本主义文明核心地带,也陷入了现代性与多元性的意识形态迷惘,西方主流文化曾经的自洽和自信也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的新时代选择

与当今世界其他地区(包括西方)的“乱象”相比,中国之“治”是异常显著和值得珍视的。作为后发国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可避免地要采用模仿西方和追赶西方的方式,采纳西方发端的现代化大工业生产力,采纳西方资本主义所奠定的市场经济的基本社会建制;同时,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谋求同世界的互利交往,要融入由资本所定向、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现行全球分工体系。从而,中国在现代化的深入展开过程中,也会遇到相似的社会

问题,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全局性问题的影响。可以说,中国也是在很大程度上再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性困境”,只不过,同西方历史上的周期性危机和当今的新困境相比,中国的辉煌成就和昂首阔步迈入新时代的发展势头才是主流。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既然走到了新时代的重大关节点上,也就需要对既往经验进行基本总结评估,并对下一步的根本方向和步骤进行战略性规划,给出超越性的智慧和方案。

现代化不能停留在资本主义的层次上,也不能选择“后现代主义”而实际上是“前现代”、前资本主义的田园牧歌幻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延续和创新,要秉持“后-资本主义”的根本超越特性,并在新时代进一步发展。我们只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视角来看问题,就能认识到现代性既有不可否认的负面效应,又有人的历史发展的积极意义。并且,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并不应归结于现代性本身,而是要把现代性之下物对人的统治追溯到人对人的统治。马克思主义也不希望现代人放弃对现代性目标的追求,而是要人们对现代性加以“治疗”,只要换一种社会制度,换一种社会组织方式,换一种价值观念,现代性理念以及作为这一理念具体实施的现代化运动完全有可能避免目前所出现的各种弊端。

## 三、新时代新思想彰显人类社会多样性、开辟和平发展新路径

### (一)中国文明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对抗性范式

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辟了人类和平发展的新路,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此作出了重要的理论阐明和行动指引。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尤其强调,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就是一部对抗斗争史。人类社会不同形态的演进,一方面标志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这种对抗以新的斗争形式出现着——人类社会的进步是在已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之间的对抗、不同的等级和阶级之间的对抗基础之上得以实现的。<sup>[6]</sup>

无论我们具体采纳哪种文明形态的阶段划分,自人类走出蒙昧和野蛮状态,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资本主义文明固然是作为文明迄今为止的最高级形态,但其所蕴含的对抗斗争也超过以往任何一种文明形态。马克思科学地指明了,人类社会并不必然永远处于这种冲突、矛盾、危机的状态之中,人类的真正前途就在于共产主义,不过,马克思仍然为通往这前途设定了“最后的斗争”：“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sup>[13](p.66)</sup>

而在当今世界,人类文明的进步是否就必然在狭义的斗争对抗中实现呢?我们认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之后,人们完全可以作出另外的回答,中国道路实际上开辟了人类和平发展的新路,特别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一条和平共赢的人类发展新路,更加现实、清晰地展现出来,并且随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这条道路在理论层面得到了提炼、总结,对人类文明发展具有更大意义。党的十九大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略条目之下首先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sup>[11](pp.57-58)</sup>它使人类文明摒弃“独占”“独霸”“独尊”思维,树立“共有”“共享”“共赢”理念是可能的,它把不以扩张主义为出发点、也不以霸权主义为必然归宿的人类文明发展前景,生动地展现在人类面前。<sup>[16]</sup>

### (二)中国文明守护人类社会发展多样性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方略,首先彰显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在资本主义“独占”“独霸”“独尊”的声浪之下,保存了一方充满希望的净土。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中,西方文明形式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唯一形式。西方世界在自身工业文明的先发优势下,在资本主义开拓市场的内在冲动趋势下,确实“吞噬”或者至少是“笼罩”了人类世界的各个文明体、文明样式。但“西方中心主义”者就此毫无批判地把西方文明在特定发展条件和自身传统下形成的、打上资本主义烙印的文化价值,说成是人类文明的所谓“普世价值”。

由于苏东剧变,人类社会探索新的文明形态的第一波伟大实验以失败而告终,这更使得“西方中心主义”喧嚣一时,例如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撒切尔夫人的“别无选择”论等。与此相对的,固然西方也有一些论者持谨慎、怀疑态度,例如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就提出,“冷战”结束后,世界绝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资本的“一”之下,人类文明仍然充满着冲突的“多”。但是,亨廷顿也只能在一种实证主义的、非批判的思想层次上,把这种冲突笼统地归结为“非西方文明的各民族与西方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冲突”,<sup>[17](p.125)</sup>这仍然是幼稚的、肤浅的。真正具有历史深刻性的反驳是中国道路,只是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用鲜活的实践,展示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鲜明特色的另一种现代化之路,才冲破了资本主义笼罩世界、抹杀一切独立性的迷雾,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

并且,党的十九大报告全面论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进一步从“分庭”走向“抗礼”,我们在理论上系统建构了意识形态的中国话语,解构上述“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从这些理论上的归纳来看,无论是“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还是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都显现出丰富的中国底蕴和社会主义风采。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这是一种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超越资本主义消极方面的社会发展方案。可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意味着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式的自觉。

### (三)中国文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当前世界格局孕育大变革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国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实体,还要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姿态,面对挑战与机遇、危机与良机,推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化局面。中国道路是一条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之路,我们欢迎各国搭乘中国经济发展快车、便车,不搞掠夺称霸,倡导合作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就是要落实到中国所参与和推动的“普惠、包容、分享、共赢”的世界各国生存与交往的实践当中。

第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进一步扩大

对外开放,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协调“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关系,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契合亚欧大陆实际需要,为低迷的世界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就是要让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就是要让世界更好分享中国发展的一大现实抓手。并且,“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落实,使世界各国经济更加紧密连接,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就业岗位,推动各国基础设施建设和体制机制创新,增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和文明素养。

第二,对原本是由西方资本主义按照自己的原则和面貌打造的、服务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既有手段,中国用自己的因素和力量加以吸收利用,使之成为自身“走出去”的有益形式。例如,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的投票权占比提高;在欧美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抬头之际,中国坚持全球贸易自由化的主张并推进自身的自贸区建设。中国也积极创制自己的中国形式,通过博鳌亚洲论坛、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论坛、澜沧江—湄公河区域论坛等国际及区域组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开展具有自己主导力的治理实践。

除了现实手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注重从理念层次上,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治理体系,向世界提供崭新的价值指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方略所蕴含的价值取向是人民主体性和主张公平、正义、优先等,破解了西方二元对立的超然绝对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困境,这从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西方主导客观现实的整体性出发,有针对性地倡导人类文明多元发展的价值取向,为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价值基础,成为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崭新理念。

2017年2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载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成为一种具有国际共识的全球治理理念。面对全球性的危机,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没有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对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世界

各国提供了一种既实现发展又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崭新方案,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全球治理理念,有助于推动国际体系和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变革,有利于开辟人类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

#### 四、新时代新思想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示范、为发达国家解决危机打开思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扎实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文化“四位一体”的发展,特别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系统阐述中,我们明确指出自己的道路为当今世界提供借鉴。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人民一方面对自己的道路更加充满自信,另一方面也更加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道路对世界各国的示范意义。

##### (一)中国方案启示发展中国家文明道路

当今人类亟需解决的是人与人之间不平等问题,突出表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亟待摆脱贫穷落后、走上富裕道路。中国道路以自己的“特色”所创造出的成就,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已经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中国道路开创了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农业大国实现现代化的新模式,这一道路的开创不仅决定了中国的命运,而且也丰富了世界发展模式,为世界人民经由自己选择的历史道路走向现代化文明,提供了现实而又有力的示范。

党的十九大进一步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历史方位,并由此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化表达和长期指导地位。新思想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把握以及对基本路线的牢牢坚持,首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福利、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需求,与此同时,它也对世界各国人民解决自身发展问题、矛盾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提供了操作性较强的范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向世界郑重地表述出了,不仅在美好愿望的意义上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另一种选择”是可能的,不仅在生活智慧的意义上“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论是可行的,而且这种可

能性、可行性,已经被归纳提升成为科学的理论蓝图,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发展经济和促进社会进步指出了一条明确道路。

### (二)中国方案启示发达国家文明出路

中国方案对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也具有启示意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我们指出了,中国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新发展理念,要实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治理体系和格局。这是一条以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为价值取向的现代化之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着眼于改善民生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也是一条尊重规律的科学、可持续发展、包容性发展的现代化之路,实现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高度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问题时,是将“市场之手”与“国家之手”有机结合起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并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与贫富差距不断拉大、阶层固化以及阶层之间矛盾冲突尖锐化的西方道路截然不同。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推进与发展,对西方国家克服不断出现的民粹与专制、无政府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反复摇摆,有着重大的启示及矫正作用。并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问题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把人与自然作为生命共同体,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永续发展。这一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之路,为解决世界所面临的日趋严重的资源和环境问题,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理念。

### (三)中国方案是科学社会主义新文明方案

归根结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在现代历史当中,探索出了一条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既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给世界上那些在希望加快发展的同时又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全新选择,又给那些已然通过资本主义道路走向发达但积累了深层矛盾的国家提供启示。并且,这更加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我们的“完全有信心”,理应包括以中国智慧的“抓住事物的根本”的彻底性,<sup>[7](p.11)</sup>以中国方案的“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sup>[18](p.686)</sup>的磅礴力量,掌握群众,转化为物质力量。习近平反复强调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革命理想高于天的高尚情怀,这个更好社会制度的理想,指引着我们沿着当代科学社会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逐步走向共产主义。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世界各国人民提供借鉴,中国也就为社会主义的发展,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 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新的文明样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为人类文明应对当今的重大挑战、解决日益尖锐的矛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为人类追求文明进步开辟一条新路。如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仅仅归结为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么这种认识肯定是肤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带来的不仅是GDP的高速增长,而且是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探索出了一种新的发展方式,而在这种新的发展方式的背后,中国人民正在创造一种新的存在方式,两者结合起来造就了人类美好生活全新的文明样态。<sup>[19]</sup>

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重大课题,解决了它们就把人类文明又向前推进一步,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正视和解决矛盾的同时,开辟着自己的道路的。<sup>[16]</sup>中国道路在解决当今人类社会内部的矛盾、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矛盾过程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和经验,找到了前进的方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不到40年的时间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程已被世界公认。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绝不能仅从物质需要与经济发展的狭隘角度出发,而要把它当作一个全面完整的文明体来考察。

特别是在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经以系统的理论形态,为解决时代矛盾提供了遵循。从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新思想也就蕴含着当今文明的长足

进步,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着历史性的贡献。我们常说,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一脉相承”,或者如习近平所说,共产党人“不忘初心”,这种“脉”或者“心”就包含着人类文明的“文脉”和“心智”。这绝不是抽象、空洞的文学比喻,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内容,其中就包括对人类社会的存在样态、运动规律、发展趋势的科学看法,以及为广大人民群众求解放、谋幸福的立场取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整个地构成了人类文明当中看待这些问题的有机组成部分,为开创新时代文明道路提供指导。当我们逐步接近走上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所能直接预见到的历史任务轨道、开启新的“伟大斗争”和新的“伟大社会革命”时,我们愈来愈渴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能指引人类不断朝着更高阶段迈进,追求更加美好生活。

作为文明新样式的新的“伟大斗争”和新的“伟大社会革命”,生动体现在美好生活和美丽强国的目标上,乃至是在“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基础之上,昭示着、部分实现着更加丰富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当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和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对未来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形态进行设想的基本原则一样,都还要受到现实条件的制约,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维度还只能是部分实现,尤其是还要留存资本因素和资本原则。与此同时,我们运用社会主义活的制度因素,运用共产党人和全体人民活的主体因素,驾驭和引导经济社会发展方向,服务于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的根本利益,不断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积累条件。

放眼观察当今中国,不仅要看到这个拥有13亿多人的大国是如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还要看到其如何力图将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司空见惯的那种破坏代价降到最低限度;不仅要看到中国如何努力把蛋糕做大,还要看到其千方百计使做大的蛋糕惠及所有人;不仅要看到中国如何注重经济发展,还要看到其如何注重民生的改善、维护社会的稳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不仅要看到中国如何强调经济建设,还要看到其如何强调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不仅要看到中国在如何满足人的“市民社会”的物质需求,还

要看到其如何通过社会主义来塑造“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的一代新人。透过这些,就能深刻地领悟到当今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就可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真正内涵。<sup>[19]</sup>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它的新时代、新思想的最新前进方向,代表了对一种真正的美好生活,对真正属于人的生存状态的追求,是对正处于危机之中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支配下的人类存在方式的革命。<sup>[19]</sup>在这个意义上,不论如何高估其对人类文明、对世界历史的意义都不过分。

###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赵家祥.对质疑“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质疑——与段忠桥教授商榷[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
-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9]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0]武力.中国计划经济的重新审视与评价[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4).
- [11]陈学明,陈祥勤,姜国敏.论中国道路蕴含的“马中西”三大资源及其交互贯通[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6).
-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 [13]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12-27.
- [1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15]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 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8-01-06.
- [16]陈学明.论中国道路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贡献[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
- [17][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 [18]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9]陈学明,金瑶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世界意义[J].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02-08.

责任编辑:澄宇义凡

**The Pioneering Contribution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n the Hist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China chose socialism, founde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led a modernization pathway that transcends western capitalism. A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ed a new age, we should launch new “Great Combats” and “Great Social Revolutions”, take on current major challenges against human civilization, and achieve new progress. China’s proposal for new civilization exhibits the diversity of human society, opens up a new pathway for 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provides guidance for the developing country’s as well as enlightenment for crisis solving in developed countri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s thoughts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age, China is bound to open up a new civilization for better human life. (Chen Xue-ming, Ma Yong-jun, and Jiang Guo-min)

**The Significance of Xi Jin-ping’s Thoughts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 Perspective from the History of Global Socialist Development:** The socialist development all over the world has been severely frustrated in the aftermath of Cold War. However, the history has far from terminated and “peace and development” is still the theme of the age. Chinese socialism faced numerous difficulties in key times, made progress and continually realized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through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new ages, we should further uphold the stance centered by interests of people, working for people, relying on people as well as benefiting people and continually promote social equality and justice. We should neither take on backward and rigid path nor choose the wrong way to counter with the authority. Instead, we should systematically reply to the issues in terms of theory and practice—what kind of Chinese socialism we shall develop and stick to, how we shall uphold and develop Chinese socialism—effectively work out challenges against worldwide socialism, and contribute Chinese approach for exploring better institution for human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s on the way to deepening reform and opening-up with steady steps. Based on great experience from reform and opening-up, we shall break through rapids and setbacks, remove stubborn miasma, and make new contributions to the socialist development all over the world through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ist national governance by the means of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Xiao Wei, Han Yu-li, Lin qing, and Ren Shuai-jun)

**The Significance of Xi Jin-ping’s Thoughts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n Term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study Xi Jin-ping’s thoughts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n term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C imposes great importance on upholding and developing Chinese socialism as well as promoting the ongoing development of the CPC and the nation. Through 97-year hardship and struggle, the Chinese nation accomplished three historical leaps from standing up, bettering up to getting stronger. In the phase of getting stronger, it is urgent to solve three major issues: building up a powerful country with economic strength, bringing about quality development and elevating national anti-risk capability. Confronting unbalanced development, we shall work out the unbalance between industries, regions and groups by means of balanced, coordinated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We shall solve the inadequacy of development by leveraging the decisive role of market in resources distribution, advancing from high-speed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meeting people’s upgrading demands. In the process from being rich to being strong, Xi Jin-ping’s thoughts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mpose a great impact on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is was illustrated in three aspects: guid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the world; updating the status of people with a people-centered focus; and building up a model for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political party relations all over the world as the principle of achieving shared growth through discussion and collaboration becomes the mainstream for global governance. (Zhou Wen and Fang Qian)

**Leading a New Era with New Thought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Xi Jin-ping’s Thoughts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course of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CPC endowed the whole nation with the sense of united coordination and independence, made Chinese nation a great nation standing in the world among all nations, and successfully explored a socialist pathway in bid for the great revit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Xi Jin-ping’s thoughts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confirmed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the revitalization undertaking, clarified the goals, pathways, bottom lines and guarantee for the course. Based on more 5000 years of civilize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Xi proposed new thoughts of revitalizing the Chinese nation at the height of the unity and integration of Chinese community as well as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face of series of major issues and challenges. This idea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he CPC’s major ideologies on the Chinese nation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CPC 90 years ago, opened up a new great expedition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nd led the great revit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to a new age. (Wu Xin-wen)

**On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PC in a New Era:** The CPC for the first time put the party’s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n the first place at its 19th national congress, which innovated Marxist theories of party construction. This is not only a summary of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strict party discipline, but also the logical necessity of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development. The party’s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s the fundamental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and the other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must finally be oriented towards political construction. To strengthen the party’s political construction, we must firmly establish the “four consciousness” and firmly uphold the authority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s well as the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basic line of the party, normalize the political life within the party, and strengthen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party members. (Wang Bing-lin and Fang Zheng)

**The Inclusiveness of the Socialist Political Part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s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clusiveness is one of the key characters of China’s multi-party cooperation system, defined by the continual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CPC and other democratic parties, embodied in the politics inclusiveness of the CPC, and rooted in refine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s and co-existent Chinese party culture. Since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the inclusiveness of Chinese political party institution has been reinforced in multi-faceted aspects, exhibiting its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highlighting Chinese political party institution against its international counterparts, and making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civilization. At present, the inclusiveness of Chinese political party institution is still improving. (Liu Cheng and Chen Cheng)

**INo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Party’s Policy of “No Religious Belief Among the CPC Members” with That of “Free Religious Belief”:** As a principle for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and political discipline, that the CPC members are forbidden to have any religious beliefs is decided by the party’s basic dialectical materialist outlook. Since joining the party, members has picked up the freedom of not holding any religion, which also acts as a way to bring about citizen’s legal rights. Allowing party members to take on religions or allowing religious members to join the CPC practically isolates political belief with religious one, and confuses potential party members with members of the united front. Only the party members without any religious belief could comprehensively carry forward the policy of “free religious belief”, unswervingly launching the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of Marxist atheism. (Zuo Peng)

**The Consolidation of Ideological Leadership in a New Era:** Ideological leadership concerns the safety of banner, pathway and politics. As a premise for our party to get a grip on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and discourse for ideological work, the leadership is actually a progressive course. The new era poses a new historical position for Chinese socialism. In the present historical position, the Party’s ideological leadership has been challenged when we are approaching the great revit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ideological publicity requires further improvemen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becomes fragmented, new media platforms emerges, and the cognition of ideological work deviates. Currently, only by deepening the localization, modern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continually innovating ideological publicity, hav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run through higher education, building up a favorable atmosphere for public opinion, and implementing the system of responsibility in ideological work could we deal with change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challenges from various undertaking for ideological leadership. (Chen Di-hua)